

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的 内在逻辑、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

彭冰冰

【内容提要】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的协同推进，在价值维度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超越，在历史维度上推动了文明范式的根本转型，并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得以具象化。这一协同机制依托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多维联动发生作用：自然系统通过生态阈值设定发展边界，经济系统以绿色生产力重塑财富生成逻辑，社会系统通过“文化-制度”协同变革打破利益分配失衡机制。其实践路径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协同治理体系为制度基石，以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的双向融合为经济引擎，以全民生态教育与基层民主实践为文化支撑，形成“制度赋能-产业驱动-价值引领”的实践闭环。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 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文明超越

作者简介：彭冰冰（1979-），嘉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嘉兴 314001）。

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贫富差距的加剧成为制约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不仅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原则，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此背景下，探索一条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保护生态环境，还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道路，成为各国政府和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的协同诉求尤为迫切。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同时，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因此，将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有机结合，实现两者的协同发展，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中国方案。

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深入探讨了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奥康纳从资本积累的视角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必然遭受极端破坏的规律，进而论证了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并指出这一危机将推动资本主义走向覆灭，最终走向社会主义道路^①。福斯特则立足于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内在矛盾^②。国内学者则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研究”（2023JDZD035）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2-298页。

^② 参见〔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7-196页。

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相结合的发展理念，并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例如，有的从构建绿色生产体系、生态正义的分配体系和绿色消费体系三个方面探讨了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的路径^①，有的探讨了生态文明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内在机理及协同路径^②，等等。总体上看，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部分研究过于强调经济视角，忽视了文化维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过于注重政策分析，缺乏对内在机制的深入阐释。本文尝试以“生态-经济-社会”系统思维构建“逻辑-机制-路径”分析框架，从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的内在逻辑出发，深入探讨其相互作用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不同地区的实践经验，提出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一、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的内在逻辑

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的协同推进，既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与贫富分化难题的实践突破。这不仅体现在价值维度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超越，更贯穿于历史演进中文明范式的根本转型，并最终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得以具象化。从价值逻辑的批判性超越到历史逻辑的转向，再到制度逻辑的文明超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将生态正义与社会公平作为核心命题，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理念。

1. 价值逻辑：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超越

一方面，生态文明作为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核，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变革，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被视为资本积累的工具，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异化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对立关系。这种“物质至上”的发展观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进步，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形成了“生产-污染-贫困”的恶性循环。生态危机的加剧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要求对自然的无限掠夺；另一方面，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这种掠夺必然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作为对资本主义发展观的扬弃，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追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不仅是发展理念的转变，更确立了“生态福祉即民生”的新型公平观。人们不再将物质财富的增长视为唯一目标，而是将生态福祉纳入民生范畴，强调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生态产品的供给对于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性。这种转变不仅体现了对当代劳动者生存环境的关切，也体现了对后代子孙生态权益的责任担当。同时，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实现生态资源的公平分配和共享，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态产品，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另一方面，共同富裕作为生态文明的目标导向，进一步强调了生态成果的普惠共享，是对生态殖民主义的批判与超越。资本主义生态殖民主义的本质在于：发达国家通过将污染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掠夺其自然资源，实现自身的生态安全与经济繁荣，而发展中国家则承受着环境污染与贫困的双重苦难^③。这种全球生态剥削体系，不仅加剧了全球生态危机，也加深了全球贫富差距。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通过发展绿色生产力，将生态保护纳入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在生产关系方面，通过完善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公有制构建起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制制度框架：一方面，依托宪法确立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建立统一确权登记制度，将山水林田湖草沙

① 参见郑海友：《论实现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的三大体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② 参见钟清莲、刘华：《生态文明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内在机理及协同路径》，《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③ 参见刘顺：《警惕生态殖民主义陷阱》，《历史评论》2022年第5期。

等生态要素纳入全民所有资产清单；另一方面，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可量化、可分配的公共财富。在此所有制基础上，通过生态补偿、生态扶贫等制度设计，确保生态财富的公平分配，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注重公平、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和保护生态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同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交往推动人类解放的经典命题具象化为南北国家协同治理实践，以共同但有区别的生态责任框架重构全球治理权责体系，为破解资本主义全球化下的生态剥削困境提供了制度性方案。

把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辩证统一起来，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超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它表明，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共同富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目标；生态权益的公平分配是消弭贫富差距的重要途径，共同富裕是生态正义的最终体现。这一辩证统一关系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2. 历史逻辑：从矛盾对抗到和谐共生的范式转型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方式的进步和人与自然互动方式的深刻转变。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工业文明深陷“增长-污染-分化”的恶性循环，而生态文明则标志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矛盾对抗走向和谐共生的范式转型。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资本增殖为核心逻辑，将自然视为无限攫取的对象，产生了“自然工具化”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驱动资本无限扩张，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形成冲突，最终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二是资本逻辑与社会正义的矛盾，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资本家占有，劳动者与自然同时沦为资本剥削掠夺的对象，加剧了贫富分化与生态危机；三是短期利益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矛盾，资本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忽视生态系统的长期承载能力，导致环境污染与资源枯竭。这些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双重爆发。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构成了社会存在的基本样态。这种劳动形态不仅将人的类本质降格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更通过商品拜物教机制使社会关系普遍陷入物象化的窠臼。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被扭曲为抽象的交换价值关系，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延伸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倒置。更为根本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追求资本无限增殖的过程中，破坏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过程，造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新陈代谢断裂”。资本主义通过无限的资本积累，迫使资源过度开采、环境成本转嫁，将生态保护让位于利润追逐，最终将经济矛盾转化为系统性生态破坏。

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的扬弃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性超越，它标志着人类从机械论世界观支配下的“控制自然”范式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范式转变。这种文明形态的转型绝非技术改良层面的量变积累，而是植根于社会生产关系根本变革的质变过程，其核心在于通过重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形成“绿色生产-公平分配-可持续消费”的良性循环。在生产方面，构建绿色生产方式，突破资本逻辑对生产力发展的单向度宰制，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辩证统一，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可持续性原则内化为生产过程的构成性要素。在分配方面，通过生态补偿机制、碳交易制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新型分配形式，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这种共享发展范式，突破了资本主义将自然资源私有化导致的“生态剥夺”困境，在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当代人权益与后代人福祉、物质财富与生态财富的辩证统一中，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共享发展道路。在消费方面，倡导消费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将生态理性嵌入消费行为，使消费回归到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①的本来意义，实现从“虚假需求”到“真实需要”的历史性转变。

3. 制度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超越性

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的协同推进，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生态治理领域的集中体现。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制度创新与实践探索，实现了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超越，展现了独特的文明超越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②。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虽然在形式上强调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但在本质上仍未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桎梏，存在以下根本性局限。一是其理论建构回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尽管其试图通过重构“政府-企业-公众”的三元互动机制来实现生态治理，但其理论预设建立在西式民主制度的理想化图景之上，即假定代议制民主能够确保公众通过选举政治实现对政府环境政策的有效监督，并在既有的利益博弈框架内达成生态共识。然而，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固有矛盾日益凸显，政治极化导致选举政治异化为“否决政治”，环境治理沦为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牺牲品。在实践层面，西方国家政府在环境议题上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或通过空头支票式的政策承诺掩盖实质性的不作为，或诉诸民粹主义话语转移矛盾焦点，或通过“退群”等霸权行径转嫁生态责任。二是其陷入普遍主义的认识论误区，将基于特定历史条件的西方经验抽象为普遍模式，忽视了全球生态治理中的结构性不平等。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技术标准、市场准入等新型绿色壁垒，将生态治理异化为新殖民主义的工具，以环保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巩固其在全球利益分配和规则制定中的垄断地位^③。这种理论预设与实践后果的悖论，不仅无法解决全球生态不平衡问题，反而再生产了新的不公，充分暴露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局限。

与之相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的辩证统一中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制度环境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制度环境的本质是特定社会形态中生产关系的制度化表达。制度环境既承载着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历史使命，又通过规范经济活动的边界和方式，确保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持续运转。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实践植根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的协同治理机制，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发挥了政府、市场和社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协同作用。首先，有为政府的引领作用彰显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生态治理中的制度优势。通过顶层设计与政策引导，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双碳”目标的提出与实施，不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战略规划能力，更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协调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方面的独特优势。这种制度优势使中国能够突破资本主义国家在生态治理中面临的“公地悲剧”困境，实现生态治理从局部改良到系统推进的历史性跨越。其次，有效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辩证统一。这一实践创新整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与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在生态治理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制度效能优化路径。最后，有机社会的广泛参与构建了生态治理的群众基础。通过生态文明教育、公众参与机制等途径，培育了全社会的生态意识与环保自觉，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治理格局。习近平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2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62页。

③ 参见兰洋：《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突破》，《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总书记提出：“广泛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创建活动，推广绿色出行，通过生活方式绿色革命，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①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并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

二、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的作用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多维联动，构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自然系统的生态承载力为共同富裕设定了刚性约束，倒逼发展模式转型，推动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平衡；经济系统通过绿色生产力的重塑，实现了自然资源向经济效益的转化，优化了财富分配格局；社会系统则以生态文化为核心，重构了价值观念与制度安排，推动了生态权益的普惠共享与社会公平的重构。三者相互交织、协同作用，形成了“自然-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实践闭环，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与文化支撑。

1. 自然系统：生态承载力对共同富裕的刚性约束

在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存在着“先占”的认知倾向。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提出，只有当劳动赋予物质以价值时，物质才开始具有价值。而自然始终无偿向人类提供物质和力量，因此，“自然的赠予不论其效用如何，都不具有价值”^②。但是，自然资源无价值并不等同于价格低或可无偿使用。受传统观念影响，很多人将“资源无价论”简单理解为自然资源能免费使用，觉得自然资源供给无穷无尽，从而肆意挥霍或低效利用资源。还有人认为，科技进步会让新的替代资源和更多资源储量被发现，“资源枯竭论”不过是投机者的牟利手段，资源枯竭是未来之事，非当下问题。可现实是，自然资源正加速减少，因资源供给紧张引发的市场价格持续上涨，已然为人们敲响了警钟。

自然系统的生态承载力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既构成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能空间，也以刚性约束的形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将自然简化为人类利用和控制的对象，其无限增殖的本性必然与自然系统的有限性发生对抗，导致“新陈代谢断裂”——即人类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的系统性失衡。生态阈值作为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的临界点，本质上是自然规律对人类活动的规约，它通过资源环境利用上限的设定，迫使社会发展模式在生态理性与资本逻辑的张力中实现历史性转型。以水资源红线为例，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无节制开发导致全球性水危机，而中国通过严格划定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不仅遏制了高耗水产业的盲目扩张，更催生出节水技术革命与循环经济模式。这种“生态倒逼型”转型机制在土地利用与大气治理领域同样显现其历史效力：生态保护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的双重划界，既遏制了资本对土地的掠夺式开发，又保障了土地资源的代际正义；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则通过污染物总量控制与产业绿色升级的辩证互动，实现了环境质量改善与人民健康权保障的统一。通过将生态阈值转化为制度性约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成功突破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自然生态局限，实现了发展模式从“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的范式转换。

生物多样性作为地球生命系统的物质根基，既是人类文明存续的生态保障，更是社会财富公平

①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6页。

② [法]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谐经济论》，王家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91页。

分配的自然载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区域性贫困治理的有机耦合，正是这一辩证关系在实践层面的具象化表达。中国通过国家公园体制创新，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在严格保护核心生态功能区的同时，创造性地发展出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新型业态。这种制度设计既突破了传统自然保护与经济对立的二元对立，又通过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探索，实现了“自然‘化’人”与“人‘化’自然”的辩证统一^①。例如，三江源国家公园通过建立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使当地牧民转化为生态守护者，其收入结构与生产方式的重构不仅保障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更实现了社会公平与生态正义的双重提升^②。在制度创新层面，生态补偿机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碳汇交易等市场化手段，对因生态保护而受限发展地区进行经济补偿与政策扶持，确保了生态权益的公正分配。此外，依托生物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生态旅游等产业，辅以生态教育与技能培训的强化，不仅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更提升了农民的环保意识与能力，展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区域性贫困治理耦合的协同效应。这种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同演进，用实际成效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既能保护好生态环境、实现社会公平，又能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2. 经济系统：绿色生产力改善财富分配格局

绿色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质态，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③，其本质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扬弃。绿色生产力的发展通过重构劳动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推动了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向，具体表现为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的双重运动：生态产业化将自然资源纳入社会化生产体系，通过碳汇交易、生态旅游等实践形式，使自然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转化为可量化的经济价值；产业生态化则以循环经济与绿色技术创新为媒介，将生态理性嵌入传统产业升级过程。例如，工业园区通过实施循环经济改造，实现废水、废气、废渣的资源化利用与减量化排放。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协同发展，实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生态文明维度上的再调适。其意义在于：通过将自然资本的再生产纳入社会总资本循环，绿色生产力既克服了资本主义的“新陈代谢断裂”困境，又为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生态产业化创造的就业与增收渠道，使乡村地区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共享性财富；产业生态化驱动的技术革命，则通过降低环境成本与提升资源效率，实现了社会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

绿色生产力的历史作用不仅限于生产领域的变革，更通过要素分配机制的重构，实现了财富分配格局的生态正义转向。马克思指出，“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④，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与绿色金融体系的协同创新，正是对资本主义分配逻辑的根本性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金融要乘势而上、先立后破。”^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过 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将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转化为可交易的经济要素，通过政府购买、生态补偿等制度设计，将生态保护的“正外部性”内化为劳动者的实际收益。例如，碳汇交易使农民从“生态守护者”转化为“价值创造者”。绿色金融体系则通过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导向与金融工具创新，重构了资本流动的生态理性：一方面，通过降低绿色产业融资成本，打破资本逐利性与生态公共性的对立，使金融资本从“剥夺性积累”工具转变为“再生性积累”媒介；另一方面，绿色

① 参见胡德庆、廖小琴：《“自然‘化’人”与“人‘化’自然”具体的历史统一——从〈自然辩证法〉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4年第2期。

② 参见董丝雨：《建设全民共享的国家公园》，《人民日报》2025年2月4日。

③ 参见俞海、宁晓巍：《绿色生产力的理论探究与实践进路》，《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1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8页。

⑤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第503页。

债券、绿色保险、碳金融等产品的设计，将生态风险定价纳入市场机制，迫使资本逻辑在生态阈值约束下进行自我调适。这种分配关系的双重改变，不仅促进了资源要素向绿色领域的优化配置，推动了绿色生产力的发展，更在深层结构上推动了生态财富全球分配的公平化进程。

3. 社会系统：生态文化驱动社会公平重构

生态文化作为社会系统的意识形态内核，通过重塑价值观念与构建生态伦理，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异化逻辑的超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的劳动异化在生态维度上表现为“自然-人-社会”关系的系统性扭曲：资本主义将自然降格为资本增殖的工具，通过“物质至上”的意识形态将生态剥削与阶层固化编织为同一统治结构的双重面相，从而在追求无限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加剧了生态危机与社会不平等，最终形成了对自然与人的双重压迫。而生态文化通过公民生态教育与社会化传播机制，实现了对商品拜物教的文化祛魅：环保课程与社区实践不仅解构了消费主义对劳动异化的遮蔽，更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内化为集体无意识。这种价值观转型的意义在于，它通过生态决策民主化（如社区环境议事会制度），将生态权益分配从资本主导的“精英治理”转向以人民为主体的“参与式治理”（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化在此过程中不仅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超越，更通过构建“生态福祉即民生”的新型公平观，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文化领导权的实践范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①。

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制度创新将生态伦理系统性嵌入治理规则体系，以生态制度的稳定性重构生产关系形态，进而打破传统发展模式下“资本-权力”对资源垄断的共谋结构。在实践层面，生态文明建设依托生态产业化路径，推动乡村生态资源确权赋能，构建以GEP核算为基准的生态资产定价机制，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产权制度改革。这一制度重构不仅使农民从生态保护的外部性承担者转化为内生性受益主体，更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消解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壁垒。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激活了乡村沉睡资源，而绿色金融与ESG投资理念则引导资本向环保产业倾斜，重构了资源环境要素的分配格局，形成生态要素参与分配的新机制。这种制度化的意义在于，通过将生态伦理嵌入生产关系，不仅实现了发展成果的普惠共享，更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中形成了生态文明实践的闭环。当自然系统通过生态阈值设定发展的物理边界、经济系统通过绿色生产力重塑财富生成逻辑时，社会系统则以生态文化为纽带，通过“文化-制度”协同变革打破利益分配失衡机制。在“自然-经济-社会”三元辩证框架下，社会公平正义不再停留于抽象的道德诉求，而是通过生态制度化的物质实践，升华为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历史确证。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的实践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的协同推进，亟须通过制度创新、动能转换与文化重构的系统性实践路径来实现。这一实践路径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协同治理体系为制度基石，以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的双向融合为经济引擎，以全民生态教育与基层民主实践为文化支撑，形成“制度赋能-产业驱动-价值引领”的实践闭环。通过跨区域生态补偿、碳交易市场构建与全民生态教育等具体举措，既突破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态剥削困境，又重塑了生态资源转化为普惠性财富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页。

的分配机制，更培育了生态正义的社会共识。

1. 制度创新赋能生态共治：构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协同治理体系

制度环境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也是社会外部因素作用于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它既是社会整体利益的承载者，也是社会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其实质是将社会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制度化，使其具备权威性约束力。如此，才能保障各利益主体关系相对稳定，从制度层面减少并杜绝利益冲突，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协调利益矛盾的成本，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成本趋向最小化。要通过以下制度创新，形成“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的协同治理体系，共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一要强化政府履行生态治理职能的顶层设计。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的协同发展过程中，制度创新是关键驱动力。政府要通过制度创新将生态治理上升为国家意志，应通过法治体系完善与绩效考核重构，将生态治理上升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刚性约束条件。以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为范例的跨区域生态补偿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区域间利益关系的辩证调节，通过财政再分配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实现生态正义的历史性进步。要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明确各级代理主体责任清单，建立覆盖确权登记、价值评估、流转交易的全过程审计机制。筑牢资产流失安全防线，实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动态监测预警，对生态红线区、战略资源区实行穿透式监管。同步完善市场化配置机制，通过产权流转、生态补偿等制度设计释放资源要素活力，确保在盘活存量资产与防范国有资产流失间实现动态平衡，彰显公有制在生态治理中“保安全”与“促发展”的双重制度优势。

二要激活市场经济调节生态矛盾的功能机制。要构建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体系，完善配额分配机制与碳价形成机制。通过市场化定价倒逼高耗能产业技术升级，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市场化减排激励与约束机制，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在绿色金融领域，应大力创新产品供给模式，有序扩大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积极探索开发生态保护领域的新型险种。运用资产证券化、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等结构性金融工具，有效降低绿色项目融资成本，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持。建立科学规范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国家标准，推动将GEP核算结果深度融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及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体系。通过生态要素确权登记、生态资源资产交易平台建设等制度创新举措，引导社会资本有序向生态友好型产业集聚，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共进。

三要构建资源消耗总量管控的成本约束机制。利润最大化作为经济激励机制，易使企业过度追逐经济利润。这会弱化成本约束机制，造成其形式化与片面化，进而引发社会生产无序扩张，加剧资源耗竭与生态恶化，侵蚀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为遏制生产过度扩张，增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韧性，必须强化经济活动的成本约束机制。应将“成本最小化”作为核心导向，在保障经济适度发展的基础上，精准控制资源消耗总量，推动经济发展从效益激励模式向成本约束模式转变。契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经济机制，应遵循成本最小化而非利润最大化原则^①。成本最小化原则要求将经济活动对自然与生态资源的消耗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既满足当代人福祉提升需求，又保证资源“不削弱无限期地提供不下降的人均效用的能力”^②。通过构建资源消耗总量管控的成本约束机制，把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消耗与危害限定在安全的生态阈值之内，实现经济与

① 参见谭顺：《从效益激励到成本约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范式转换》，《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② [英]埃里克·诺伊迈耶：《强与弱：两种对立的可持续性范式》，王寅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9页。

生态的协调发展。

四要培育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治理的主体意识。深化“环保督察+公众监督”协同机制，完善生态环境问题线索举报奖励制度，依托数字化平台构建全民参与的立体化监督网络，通过典型案例宣传强化公众生态权益意识，形成社会共治格局。培育专业化环保社会组织，制定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指导目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委托等方式引导其深度参与环境治理，重点开展环境风险评估、污染治理技术咨询等专业服务，构建多元共治体系。实施企业环境信用分级评价制度，建立生态环境部门与金融、税务部门的数据共享机制，将评价结果纳入金融信贷审批、税收优惠核准等政策实施依据，激励企业主动承担环保责任，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

2. 绿色动能驱动均衡发展：以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重塑经济格局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当下，绿色动能已成为撬动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支点。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的协同演进，本质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新型实践范式。从生产力维度看，生态产业化通过技术创新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推动清洁能源、碳汇交易等新兴业态发展，实现了自然资源更好向社会效益的转化；从生产关系角度观之，产业生态化重构了要素配置机制，通过绿色金融、环境规制等制度创新，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组织形态。这种双重变革可以从以下三个实践向度来把握。

一是构建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技术创新+制度革新”双轨并行驱动体系。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系统性重构的动态过程。一方面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生产力质的跃迁，突破传统要素边际效益递减的瓶颈；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制度创新重构生产关系，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针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业，应制定分阶段能效提升技术路线图，构建“碳效码”评价体系，通过富氧燃烧、氢基炼钢等工艺革新，实现单位产品能耗较行业基准下降30%以上，并配套建立阶梯电价与碳配额动态调节机制，形成“技术突破-成本降低-制度激励”的良性循环。推广工业互联网赋能绿色智造，以数字技术重构生产要素配置。在国家级经开区部署5G+工业物联网示范工程，运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能耗动态仿真模型，通过技术赋能推动生产关系智能化升级，实现生产全流程能效优化。立足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双重目标，创新农业绿色转型制度供给，在粮食主产区推广“测土配方+智能灌溉”数字化托管模式，依托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建立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包，实现农业生产的绿色化和高效化的有机统一。

二是优化区域绿色产业布局，以科学合理的产业规划推动经济与生态协调共进。区域绿色产业布局的优化，必须充分立足各地生态禀赋差异这一客观实际，精准识别不同区域的生态功能定位与资源承载能力，进而形成“分类施策、协同互补”的良性发展格局。在生态优势区，应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发展林下经济、碳汇交易等生态产业化项目。例如，福建三明的林业碳汇交易实践，不仅促进了当地林业经济的发展，有效带动了林农增收致富，还有效提升了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①。在传统工业区，需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园区建设，以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为突破口，构建起完善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通过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的大幅提升，从源头上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②在生态脆弱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更为突出。

① 参见董丝雨：《更好发挥林草碳汇的作用》，《人民日报》2024年9月4日。

②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7月19日。

此时，实施生态移民与产业置换策略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之举。通过有序组织生态移民，既能够有效减轻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又能够为当地经济的转型发展创造条件。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通过土地产权置换实现生态搬迁与产业转型，为生态脆弱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三是培育新兴绿色增长极，深化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路径。开展生态经济制度集成改革试点，全力探索生态资源效益转化的有效机制。紧密结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充分运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手段，对生态资源价值展开更为精准的评估。在浙江、福建等生态优势区推进“GDP与GEP双考核”省级示范区建设，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与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资金分配的联动机制。借助大数据分析，使核算结果更加科学准确，让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更加合理高效。创新排污权、碳汇权益等资源环境要素跨区域交易制度，运用区块链技术保障交易的透明性和安全性，形成生态资源市场化配置新格局。同时，大力实施绿色产业集群培育工程，聚焦氢能储能、生物基材料等前沿产业领域，设立千亿级绿色产业发展基金，加大对新质生产力相关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的投入。在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国家级绿色技术创新中心，构建“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体系。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协同，推动绿色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形成绿色产业集群发展新动能。此外，积极构建“一带一路”绿色产业链，支持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项目国际合作，推动绿色技术标准的对外输出，促进全球绿色技术共享与产业的协同发展。通过这些举措，实现区域经济绿色动能提升与均衡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3. 文化认同铸就生态正义：通过生态教育与基层民主深化公平实践

生态正义的实现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土壤。生态教育与基层民主作为关键环节，是构建生态正义文化认同的重要支撑。通过生态教育，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培养公民的生态意识和责任感，为生态正义奠定思想基础。基层民主实践则为公众参与生态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让生态正义在实践中得以落实。而创新生态文化传播范式，能进一步增强生态文化的影响力，使生态正义的理念深入人心。具体来说，可采取以下举措。

一是构建全民生态教育体系，培养公民的生态意识和责任感。构建分层次生态教育体系，将生态伦理纳入国民教育全序列课程，在基础教育阶段设置生态文明通识必修课，高等教育领域开设生态治理交叉学科，实现“从娃娃抓起”到专业人才培养的全链条覆盖。建立领导干部生态政德考核制度，将生态治理能力作为党校培训的必修模块，提升领导干部的生态治理水平和责任意识。打造数字化生态教育平台，运用VR/AR技术开发“生态危机情景模拟系统”，建立沉浸式生态警示教育基地，通过碳足迹可视化系统实现个人生态行为实时反馈，全面提升公众生态责任感度。

二是深化基层生态民主实践，保障公众在生态治理中的参与权和监督权。建立社区环境议事协商制度，对涉及生态移民、污染治理等重大事项实行听证会票决制，确保决策过程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建立生态维权法律援助机制，为弱势群体提供全方位的环境诉讼法律支持，有力保障其生态环境领域的合法权益。创新生态行为激励机制，实施公民绿色生活积分制度，将垃圾分类、低碳出行等环保行为量化赋分，转化为公共服务优先权益，如医疗挂号绿色通道、子女入学加分等，并通过“碳普惠”平台实现个人减排量的市场化价值兑换，全方位激励公众踊跃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共同营造良好的生态社会风尚。

三是创新生态文化传播范式，增强生态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实施生态文化精品创作工程，设立生态文明题材文艺创作基金，打造生态治理题材影视剧作精品。构建生态文明历史叙事体系，建设多层次生态文明博物馆网络，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复原塞罕坝林场、库布其沙漠治理等标志性生

态工程演进历程，系统展示中国生态治理的成就，让公众更加全面地了解生态文明的内涵和价值。强化国际生态话语权建设，通过 COP（缔约方大会）等平台阐释中国生态治理哲学，分享中国生态治理的经验和智慧，提升中国在国际生态治理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结 语

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制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的协同关系。作为自然物质变换可持续性基础的生态文明建设，与作为社会关系合理化实践指向的共同富裕，在生产力革命与生产关系调整的双向互动中实现了历史性耦合。这种协同关系不仅有助于破解传统发展模式中的“发展悖论”——即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而且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的协同发展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数字技术的嵌入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获得虚拟化表征的新维度，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生态信用体系重构机制，不仅为解构商品拜物教对使用价值的遮蔽提供了技术中介，同时内嵌着数字资本逻辑对生态关系再异化的潜在风险。因此，未来的研究应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深入探索数字化技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应用前景和潜在风险，为数字化赋能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年。
- [2] 叶冬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 [3] 路日亮、陶蕾韬：《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 [4] 叶海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逻辑体系研究——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与理论》，《哲学研究》2022年第8期。
- [5] 李包庚：《走向生态正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
- [6] 郁庆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三重维度》，《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1期。
- [7] 孔明安：《论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共同富裕对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超越》，《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6期。
- [8] 袁祖社：《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8期。

（编辑：张 剑）